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

主编／谢冕 副主编／李杨

# 锁链上的花环

● 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

韩毓海／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

主编／谢冕 副主编／李杨

# 锁链上的花环

● 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

韩毓海／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锁链上的花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  
SUOLIAN SHANG DE HUA HUAN

韩毓海 著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10 000 字

长春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  
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印数:6 000 册 定价:4.00 元

# 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总序

谢冕

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已把二十世纪的大部分内容抛在了身后。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百年的长途之上，洒满的是汗水、泪水和血水。那是一条为苦痛和灾难所滋润的道路，那又是一条屈辱和创伤铺成的记忆之路。近百年我们中国人希望过、抗争过，也部分地到达过，但依然作为世纪的落伍者而存在。落伍的感觉残忍地抽打着中国，使我们站立在世纪末的风声中难以摆脱那份悲凉。

中国知识分子未曾辜负这一百年，他们和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共命运。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海附近出现了在当日的中国人看来是怪物的西洋舰队，那隆隆炮声中腾起的硝烟惊破了强盛的帝国梦想。随后开始的是列强为所欲为的践踏。中国从自认为天下第一的王国尊严下跌到负数。这造成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重压。

这一百年有过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知识分子没有回避他们承担的那份感世忧时的沉重。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保守麻木，使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生发出文化精英意识。这使他们自觉地对时代和社会作出承诺。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激情与作为精

英的使命感相结合，造出了极为动人的精神景观。近百年的社会激荡之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智慧的投入。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本世纪下半叶为结束中世纪式的文化暴虐而进行的抗争，中国知识分子都付出了积极的劳绩。

艰难的时势加上历史的积重，特别是与外界接触之后反顾自身，一些新鲜的先锋的思考遭受封建积习的禁锢，促使知识界的先进人士对传统文化秩序持警惕的和怀疑的态度。当挽救危亡和变革现实的奔走呼号受到传统势力的扼杀和阻挠，这种激进的立场便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与理解。由此派生出来的革命性即寓于对传统的否定之中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当日普遍的思维倾向。

这当然是一种偏颇。中国悠长的文化传统是历代中国人创造实践的综合，它拥有的智慧性和沉雄博大都曾使世人为之倾心。在古代和今日，中国文化为丰富和促进世界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无可置疑。中国人理应为自己先人的建树自豪。但中国文化在它发展历程之中形成的封建性体系和价值观，作为维护过去社会形态的原则体现，已成为现代社会前进的羁绊，这当然具有消极的品质。基于这样的前提，对传统文化加以质疑而有所扬弃有它的合理性。

我们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我们愿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这一目标的障碍。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保存和发扬那些优良传统的必要，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踩倒的激烈。

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为这种想法迎合了所有人而可能掩饰和冲淡原本的积极动机。本世纪才智之士的文化批判是前驱的抉择，觉醒的知识者心仪于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决绝于陈旧

的历史重荷。为图新而弃旧，因前进而义无反顾。他们把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一律视为压迫而指归于反抗。要是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对自由人性和民主体制的戕害，我们当然不会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行感到意外。当然，我们希望当我们面对现代的诱惑时不至于忘却先世的辉煌——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膜拜。

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时世太重也太深，为此文学曾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象；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够救民于水火。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个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

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我们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瘾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和欢愉。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梦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正是因此，我们方在这世纪黄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种和耕耘。

文学回到家园的醒悟仅仅是最近十年发生的事实。在以往我们花费在非文学上面的精力的时间太多了。在文学研究领域，这种花费表现在文学被指令无休止地为其它意识形态注释。他们借文学说他们的故事，文学真的变成了叫做传声筒的东西。现在我们终于有权力发问：文学难道不应关心自身？当然文学应该

也可能关心文学以外的世界。但不论是权威还是神圣，他们要文学做的，必须通过文学的方式和可能，这包括文学的旨趣。

文学必须建设和完善自身而后才能建设和完善社会，文学也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关注社会。这一百年的文学发展迅猛但并不健全，在某一个或几个时期（如六十年代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学甚至成为社会的破坏因素，而这一切恶行却是以庄严和神圣的名义进行的。

作为二十世纪的送行人，我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达。这种表达当然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它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意味着绝对的纯粹性，它期待着文学与它生发和发展的背景材料的紧密联系。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

以往对于文学的描写大体总是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笼罩之下进行。文学在批评和历史研究方面的独立的合法性并未得以确认，文学没有进入自由状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畴的提出为健全文学研究提供了契机。以一百年的文学为单位对文学的总体观照的方式自然地扬弃了非文学的干扰，从而有可能对文学进行独立的和自由的考察。我们希望这种文学研究不仅为纯粹学术品质的倡导提供可能性，还希望为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对我们所传达的世纪之交的情怀保留下一些特殊的记忆。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于厦门美仁新村

生命的诗章已经终了，  
它是一切财富中最昂贵的珍宝，  
它所写的都要当真，  
一切都必须实现，阿门。

.....

我必将死去，  
但三天后就会复活，  
仿佛那水流湍急，  
也像那商队络绎不绝，  
世世代代将走进黑暗，  
接受我的审判。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 目 录

第一章	阿瑞斯的金苹果 .....	1
第二章	阿基米德的支点 .....	58
第三章	从乌托邦走向列维坦 .....	77
第四章	血缘·情节·梦想 .....	116
跋：	“克服历史”与接近存在 .....	147

# 第一章

## 阿瑞斯的金苹果

---

公元前十二世纪，希腊半岛上的阿开俄斯人与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人，据说是为了争夺绝世美貌的海伦而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战争。特洛亚城因此被毁。

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向来有两种，一种认为这是一场在贪欲驱使下的屠杀，一种认为这是一场为爱和美而进行的空前壮丽的殉道。伟大的诗人荷马力图将这二者融合起来，他揭示了如下可能性，这便是爱与美的高尚情感在某种条件下也会产生出不可预料的相反的结果。

在荷马的时代，诗人把这种生存之谜归结到“争执女神”阿瑞斯抛下的金苹果。进入二十世纪，卡尔·波普尔（karl · popper）想把这个“金苹果的故事”讲下去，他因此宣称：“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出乎意外的社会反应。”波普尔的话使我萌生了写作《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这本书的念头。

我在那本书中曾写道：

“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终结，现代文化的开端。作为中国现代精神的凝结物，它成为一个巨大的空间黑洞，被每一段时间（历史）所吸附，延展和阐释，而且仿佛作为某种共时性

的永恒，与时间的绵延一道，成为现代历史构架的纵轴，在此后的七十年中不断复现自身。早在“五四”三十周年的时候，罗常培先生就曾强调，总是重复“五四”的老调子是不智的；<sup>①</sup>然而，不容回避的是，“五四”虽然已成为历史，但由中国现代的各种危机构成的精神冲突依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心理模型。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意味着“五四”现象的进一步延续还是意味着它的终结？显然，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这是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的极为深刻的时代课题。

我当时“发现”五四这个题目的激动与惊喜，大概堪与数十年前一位美国学生相比：

1952年前后，在密西根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面前，坐着一位在密大修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正讨论这位学生的博士论文题目。那位曾在北京住过多年的教授，忽然抬高了声音说：“什么！你说你要写五四运动，不行！博士论文怎么可以写学生暴动？……什么？说那是中国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思想革命？简直胡闹。你若是坚持这个题目，我们就取消你的奖学金！”这位被取消了奖学金的学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策纵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便是经典性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又译为《五四运动史》）。

我自知还不至于陷入盲目自大地比附前人的无聊，但我因为选择这样一个题目而陷入的纯粹外在的和人为的麻烦，也许正印证了周教授的话：“对这场运动的忠实叙述，对任何权威主义来说，不啻是一种威胁。”<sup>②</sup>

我在那本书里的主要观点之一可以概括如下：

---

<sup>①</sup> 罗常培《纪念“五四”的第三十年》，见《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1949，第184页。

<sup>②</sup>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麻省剑桥，1960，第305页。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巨大而深重的代价，呈现着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悲剧性交织；而那些悲剧性的代价往往被时间压入人们记忆和无意识的深层，实际上，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有时往往不是历史表层的乐观主义进化，而是被当作“代价”而压抑进历史深层的因素。对于已成“传统”的“五四”新文学，恐怕也应作如是观。

实际上，中国新文学独特的“话语”形式（包括作品的叙述模式，作家独特艺术个性后面掩映着的普遍的语气系统等等），都是建立在现代知识者特定的心理结构模式之上的。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模式的形成，则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具体形态及知识者在这一形态中所处的独特地位密切相关。

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些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知识者，当他们与相对滞后的中国现实需要发生矛盾鞍轭的时候，他们自身必然会发生人格的分裂，这种人格分裂导致的一般结果是知识者自觉地牺牲自身的个性意识，将自己纳入整个现实的具体需求之中。现代知识者习惯于将精神与现实的存在分裂为截然对立的两大块（A/B，启蒙/救亡，自由/责任，个体/群体，近代人道主义/传统人道主义）并将其理解为一个“压倒”另一个，一个为另一个“牺牲”的模式。不难看出，这种人格分裂的心理结构模式，其实是一种自我压抑的心理结构模式。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心理模式呢？这是因为：中国知识者在历史本文中扮演的传统角色总是导师和医生，这种角色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和强化，决定了他的话语必须准确、坚定、清晰并且具有保证作用，即历史总是需要他们提供权威性的或权力性的话语，而不允许他们摇摆和模糊。要么自外于历史潮流，经营自己个性化的“小圈子”，做一个甚至永不被人理解、永远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多余人”，要么破坏“小圈子”，走进现

实的洪流之中。而且，历史也从来不允许他们站在一种理论、学说的边缘交汇处彷徨流连，而是要求他们坚定地站在一种理论、学说的中心处，大声且鲜明地呐喊出哪怕是偏激的声音。而这样一来，当他们处在某一理论的中心，制造出某种斩钉截铁的“权力话语”的时候，这种权力话语在未曾规范整个社会之前，已率先压抑了或消解了他们自身。

在这种二元分裂、对立的心理结构模式之上，形成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经典话语形式，它在逻辑选择上，必定是于两项对立之中坚定地高扬、择取其中一项，而在情感取向上，也同样是爱憎清晰，等差分明；例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正是这样的典型形式：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现代启蒙主义话语的一般形式，就是这种“两项对立的等级模式”，而这种话语形式其实则是建立在现代知识者二元分裂的心理结构模式之上的。

如果说，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知识者所处的先觉者的地位与相对滞后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造成了他们人格心理的分裂，那么从传统的东方心理结构模式本身来看，那种“以情入理”，“化理为情”的伦理化的心理模式，在“五四”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五四”知识分子大都具有的理想主义的热情和浪漫主义气质，与那种冷静而理智的科学主义认识论之间，总是难以合拍的。这一方面造成伦理主义的情感纠葛，始终使他们难以达到或保持类似西方知识分子纯粹“静观”的人生态度（*Vita complativa*），同时另一方面，正是寻求“情”与“理”，认识与价值的交融，统一这种回归传统心理模

式的内在趋向，吸引着现代知识者去构筑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体系。

这种“情”与“理”，认识与价值相冲突的心理模式，同样对“五四”知识者的话语形式产生了影响。情感对于理智的压制，伦理主义对于科学认识论的融合，必然导致统一的话语形式中存在相异的两套语气系统的纠葛，从而使叙述者成为一种“不可靠”的叙述者或“清醒的说谎者”：即一方面，启蒙主义者的清醒的自我意识，时刻使说话人与他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的人协调一致；并且要时刻考虑到（话语）对听话人的影响，即“考虑到他人的情感”；而另一方面，知识者自我被压抑的个性意识又会不断地对这种启蒙主义表层意识产生威胁，并从这些意识的空隙中涌流出来，这样，在“五四”统一的小说本文中，我们则会看到两种不统一的话语形式，即建筑于意识表层的启蒙主义话语和建立在潜意识深层的现代主义话语。<sup>①</sup>

我如此繁冗而“不乏自得”地引述“自己的话”的用意，并不单纯是为了表明一种“不悔少作”的决心，实际上，直到今天依然攫住我的，正是五四所呈现出的生存和历史的悖论。这一悖论用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一句不朽的格言来概括便是：

爱与忠诚是最美丽的人情，而今却变成了暴力与斩杀。

正像前面所提到的，“斗争”与“对立”，总是意味着自身与对方的某一部分（精神和肉体）的被消灭、压抑。但是，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两个词的残酷的和可怖的意义便被逐步遮蔽、遗忘和改变了：为了抢钱而攻击别人必遭一致的唾弃，而为了失恋而杀人却甚至会掬得善男信女的一掬热泪，这个几乎是信

<sup>①</sup> 引自拙作《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手拈来的例子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与某人搏斗也许是可怕的，但是为了爱的情感而进行的奋斗、斗争却是高尚的，这种高尚的奋斗和斗争足以掩盖那种将别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欲望。

爱的情感！——这正是几乎每个五四先驱者都共有的，但是，那绝非一种世俗的、卑微的和具体的爱，不，即使是男女之爱在那时也是不带肉欲的。《小说月报》第16卷7期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文艺与性欲》的译文，译者基于当时小说“写爱情而避性”的共同之处感慨说，那不仅是一个“欲炽爱亦不能”的时代，而且也是个“欲堕落而不能”的时代！<sup>①</sup> 淦女士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蜜月旅行仅限于“亲密的接吻与拥抱”（《旅行》），而陈翔鹤小说对主人公在勾栏瓦肆中轻薄行为的描写则几乎使之成为郁达夫之后仅存的“青果”。

在“五四”时代，“爱”首先是一种“以情入理”、“化理为情”的伦理化的情感，首先意味着一种价值观范畴。子君爱上涓生的可能性前提取决于她对“我是属于我自己的”这一“个性解放”观念的迷恋，在她把自我向涓生敞开的同时，她更把自我全部地献给了这一观念。子君也许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像普通人一样具有感情的人，而应首先被理解为将感情上升到价值范畴的人。与其说她为她所爱的人而献身，不如说她为了维护一个新的爱情观念而英勇奋斗，死而后已。作为一个新的道德女神或“新道德”的女神，她牺牲在通往加利利的道路上，她的死因之照彻了无数后之来者，这就是所谓“灵光”，“殉道者之光”。

但是，在对于“为了爱而牺牲”的赞美声中，我们听到了

---

<sup>①</sup> 《文艺与性欲》，厨川白村著，仲云译，《小说月报》第16卷，第7期，1925年。

另一种声音：

……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是鲁迅还是涓生，对于为了“爱的观念”而牺牲的道路发出了反讽？反讽是现代小说最伟大的遗产之一，它是揭示生存悖论最有效的器具。

在《咆哮了的土地》、《冲出云围的月亮》、《财主的儿女们》这些作品中，我们也许都看到了类似的故事：一个财主家出身，或与财主家庭有着某种联系的革命者受到考验，为了显示革命性的坚决，他亲自放火烧掉财主的庄园甚至烧死自己的财主父母，这些革命者的行为肯定是出于爱！只不过这种据说是最大公无私的爱来自天国，是一种律令，而决非发自人间。

于是，我们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中，再也看不到某种悖论和悲剧的意味，代之而起的则是庸俗的进化 and 一派肤浅的乐观，以及绝对律令的永恒胜利，正如亚斯贝斯所说：悲剧在公平了结成为可能的情形下就荡然无存了！

约瑟夫·斯大林的爱女在纪念其父的文章的结尾曾写下了如下堪称绝唱的文字：

这个最后的中世纪的骑士！这个爱情和诗歌的赞美者！他把他光辉灿烂的理想引进了坟墓啊！

这段话像一团照彻了多半个世纪的熊熊烈火在我眼前闪现，火光中我看到那财主家里叛逆的儿女怀着巨大的心灵痛苦点燃了第一束干柴——于是我们不得不发问的是：巨大的心灵痛苦与第一束干柴燃着时的瞬息的欢乐，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在来自天国的爱的神圣观念（它无限博大）和来自人间的具体的爱的行为（它永远卑微）之间哪一个 is 虚伪的谎言？



1960年左右，在离周策纵教授写作《五四运动史》的城市不远的芝加哥，美国式的现代经院犬儒式教育正在为日后独霸文坛的“新批评”学派造就大师，而W·布斯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也许并非出自对于生存悖论的深刻体悟（新批评对此毫无兴趣），而是出自纯粹技巧性的爱好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说谎者》的启发，布斯发明了“清醒的说谎者”一词。

我想，也许没有哪个词像这个词一样准确地反映了五四一代人在理念与现实，爱的观念与爱的行为之间进行矛盾选择时所表现出的话语与心态的复杂性了，于是，我们的论述便从这一词汇入手。

## 一、自己观念的牺牲品

1762年，让·雅克·卢梭发表了他对人类现代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契约论》。卢梭在此阐释了如下惊世骇俗的观点：

社会契约能够用以下的话来叙述，“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人身及全部力量共同置于总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而我们以法人的资格把每个成员理解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结社行为产生一个道德的、集合的团体，该团体在被动的场合称为“国家”，在主动场合称“主权者”，在其它与己类似的团体的关系上称“列强之一”。

主权者的这种永远正确的意志即“总意志”。每个公民作为公民来说分担总意志，社会契约不言而喻谁拒不服从总意志，都要被逼得服从。“这恰恰是说他会被逼得自由”。

二百年前，卢梭思想的第一个伟大实践者罗伯斯庇尔被他的追随者们押赴断头台，此时此刻，在罗伯斯庇尔，他认为自